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1.022

# 《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角色位移与修辞重构

王晓燕<sup>1,2</sup>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立足《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的精细对勘,结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阐释小说正、反面人物主要代表许凤—胡文玉(从区委书记到叛徒)的角色关系和角色位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情爱叙事:[-性+爱]→[-性-爱]→[-性+恨]的修辞改写。反向追问版本变动“改了什么/如何改/为什么这样改”,管窥版本修改方式和主体在场方式互为表里的文学现场,希望为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版本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个案。

**关键词:**《战斗的青春》;角色位移;修辞重构;广义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1-0160-08

近年来,中国当代小说版本研究逐渐进入学界视野,但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有待进一步开发。特别是版本修改作为“有意味的现象、事件和个案”,一度成为正规文学史研究的“三不管地带”<sup>①</sup>。话题价值“在场”与现有研究“缺席”并置,是否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该时期同一文学作品多个版本研究的难点和痛点?研究难点和痛点孕育新的学术期待,也是对再阐释的召唤。

作为“十七年”小说版本重构个案,红色经典《战斗的青春》<sup>②</sup>自1958年出版发行,其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历经作者雪克的四次修改,分别于1960年、1961年、1962年、1978年出版了新1版、新2版、新3版以及重印本,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五个版本,呈现了数十万字的异文语料,这是珍贵的文献资源。目前关于不同版本《战斗的青春》的研究,存在两个弱关注区:其一,立足版本重构拼图的精细对勘不多;其二,未见修辞学视角的研究。这两个挖掘与阐释相对匮乏的区域,正是本文拟探讨的。

本文立足版本对勘,重返版本修改方式和主体在场方式互为表里的文学现场。结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重点阐释小说正、反面人物主要代表

许凤—胡文玉的角色关系和角色位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情爱叙事,分析版本重构局部“微表情”的修辞处理,审视“为整体的局部”,考量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生态中文化资本博弈,尝试为现有版本研究打开未经充分挖掘的解释空间。

## 一 许凤—胡文玉:角色关系与角色位移路径

许凤与胡文玉的角色关系在《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历经四次流变,两人角色关系可以借助语义分析显示为:

许凤—胡文玉(叛变前)[+爱情伴侣-性伴侣+革命伙伴]

许凤—胡文玉(叛变后)[-爱情伴侣-性伴侣-革命伙伴]

文本叙述中,胡文玉从区委书记到革命叛徒的身份变化,对应于他和许凤之间[-性+爱]→[-性-爱]→[-性+恨]的修辞改写。结合胡文玉叛变前的叛徒身份[±公开]等要素,两人的角色定位、角色关系位移在版本变动中可梳理为表1。

收稿日期:2019-06-22

作者简介:王晓燕(1984—),女,福建泉州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学语言、话语修辞研究。

①杨义:《五十年代作家对旧作的修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②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战斗的青春》列为“红色经典典藏本”再版刊行。

表 1 1960 版~1978 版“许凤—胡文玉”的角色关系重构示意图

胡文玉角色身份	许凤话语角色	两人角色关系	情爱关系重构路径
革命者(区委书记)	情感角色	[+革命伙伴]	[-性+爱]
叛徒[-公开]	政治角色	[-革命伙伴]	[-性-爱]
叛徒[+公开]	政治角色	[-革命伙伴]	[-性+恨]

表 1 每一个纵向栏都指涉了胡文玉和许凤各自的角色身份位移,角色关系以及情爱关系重构路径,胡文玉叛徒身份[±公开]和许凤角色关系随着胡文玉[±革命]以及革命程度深浅的变化呈现复杂的重构样态。版本变动沿着[-性+爱]→[-性-爱]→[-性+恨]趋势的重构修辞,需要在角色关系中观察与解释,下文分而述之。

### (一) 许凤—革命者胡文玉[+革命]→[-性+爱]

当文本叙述进度还停留在胡文玉的“区委书记”角色身份时,[+革命]是其角色形象的构成义素,版本重构沿着他和许凤关系中[-性+爱]的方向深化,增写强化胡文玉正面形象(见表 2)。

表 2 1960 版塑造胡文玉正面形象话语增写核心信息

序号	1958 版	1960 版增写	话语指向
1	无	魁伟俊秀/有魄力/有办法/不只/写得好文章/而且/讲话头头是道/生龙活虎地干/工作特别活跃/最突出的成绩/又大大提高了他的威信	正面评价
2	无	还在工作/他为什么就不困/三夜没有睡了/他就是不睡/人们多着急	侧面烘托
3	无	怀着崇拜和热爱的心情听了胡文玉的关于反扫荡斗争的报告	正面评价
4	无	知识又丰富/又有才干/多么好的一个领导干部/多么好的一个终身伴侣	正面评价

表 2 所示,塑造胡文玉正面形象的话语增写从正面评价和侧面烘托同步进行。序号 1 的增写,并非小说叙事话语的常规选择,更像是对一个人所做的政治鉴定,虽有标签化倾向,但不难看出作家对胡文玉正面形象进行话语包装的主观努力,连缀其间的话语标记“不只<sup>①</sup>……而且”“又”等连词递进式助推,叙述胡文玉外表形象、个人才

华、工作能力、工作成效。序号 2 增写了胡文玉的通讯员向许凤“告状”的内容,以此表达对胡文玉连轴转工作状态的不满,以“不满”之语增写“心疼”之意的“笔贬意扬”,彰显了表达主体对此时胡文玉所扮演的正面角色所持的正面评价。这两处都是通过许凤的回忆视角完成的,暗含许凤对爱情伴侣的情感认知,这一认知的情感语义用义素分析记作[+仰慕+心动+骄傲]。

小说的叙述语言是一种“混合语言”,各种人物的内心独白与叙述者的叙述始终交织在一起汇成了叙述流。有时特定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叙述者的直接解说,故事于是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感应”叙述出来<sup>②</sup>。序号 3 是叙述者的叙述话语,序号 4 是许凤的内心独白,两者有效交织,孵化了许凤眼中胡文玉[+革命]的形象。表达主体对胡文玉的正面定性经由许凤所“感应”到的“崇拜和热爱”得到展示,身处恋爱升腾期的许凤视爱情对象为“终身伴侣”,这是许凤对此时这段情感角色关系所做的正面定性和理想的爱情期待,此时许凤的情感角色浓郁,情感语义用义素分析标注依然是[+仰慕+心动+骄傲],这是重构文本在两人[+爱情伴侣-性伴侣+革命伙伴]角色关系中所做的修辞处理。

### (二) 许凤—未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革命]→[-性-爱]

1960 版胡文玉对革命出现犹疑、叛徒身份处于隐性状态时,[-革命]成为其角色行为的重要义素,版本重构从胡文玉和许凤分别着力,一方面通过增写,剔除胡文玉爱情的真情元素;另一方面通过置换,变许凤的情感角色为政治角色,实现了许凤对胡文玉的爱在版本重构中同步趋减,版本重构沿着他和许凤关系[-性-爱]的方向深化。

1958 版胡文玉对许凤不乏“我愿意为你活,愿意为你死,你知道吗?没有你我真活不下去……”之类的爱情表白和真情呼喊,重构文本则通过增写诋损胡文玉对许凤爱情萌发中可能的纯粹初心,将其置换为出于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功利动机,由此剔除反面人物爱情萌发中的真情元素(见表 3)。

表 3 两段增写,是“大扫荡”后毫无作为的胡文玉在一次抓捕行动中侥幸有所收获所展露出的心理活动,从掌控和功利目的展示了胡文玉对许

<sup>①</sup>此处实际应为“不止”,在引文系统中,尊重原文作者的表述。

<sup>②</sup>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1 页。

风的情感动因。“包管叫你……高高兴兴”意味着高兴的情绪不是主动流露,而是被“把控”,胡文玉对爱情对象的施爱方式,不是对爱情伴侣情绪的关注,而是对爱情关系中顺从服帖姿态的要求,连用两个“叫你”强化了胡文玉居高的俯视姿态——这种姿态在1962版的置换中进一步演绎为“征服”(胡文玉直言“我有信心征服她!”),失却了1958版中高频出现的“我这颗心一直是永远爱着你的”爱情本性抒发。

表3 1960版胡文玉心理活动的话语增写

1958版	1960版	话语目的
无	做出点成绩来叫你许风看看,包管叫我在你面前高高兴兴	掌控
无	许风跟任何一个女干部,哪怕和江丽相比,也是最美的姑娘	功利

重构文本在这个阶段实现许凤对胡文玉的爱同步趋减,更主要表现为许凤[+爱情伴侣]角色隐退,[+政治导师]角色凸显,相应文本层面的操作是置换两人角色关系中的[+依赖+不舍]情感语义,将其置换为[+教育+挽救]政治语义。对话语置换内容稍加梳理,可以发现每一组置换都呈现为情感语义与政治语义对比并置状态,限于篇幅,我们仅提炼置换语例中的关键信息(见表4)。

表4 不同版本“情感—政治”语义置换话语的关键信息

版本	关键信息	语义要素	语义指向
1958版	心软/为对方整夜没睡/因给自己难看感到难过/谈心说话/怕他和小鸾纠缠而堕落/关系破裂会难受/担心难过	[+依赖+不舍]	情感语义
1960版~1978版	帮助进步/批评/严格的批评/因态度恶劣而气愤/很危险/挽救即将毁掉的干部/不谈感情直截了当谈问题/怒其堕落自毁	[+教育+挽救]	政治语义

1958版许凤的接受反应是基于爱情伴侣的角色发出的,话语归属为情感场,义素分析记作[+依赖+不舍]。1960版~1978版许凤的接受反应是基于领导者的角色发出的,话语归属政治语义场,义素分析记作[+教育+挽救]。

由此,继续用义素分析标示胡文玉革命叛徒处于[-公开]阶段,重构前后许凤与胡文玉角色

关系的语义成分:

1958版[+仰慕+心动+依赖+不舍]→情感角色→爱情伴侣

1960版~1978版[+反感+排斥+教育+挽救]→政治角色→政治导师

深陷爱情中的人容易放任感性高蹈,而放逐理性判断。面对情感偏离或迷失的伴侣,选择原谅与否,也许只是感情深浅的评判标准,是非对错见仁见智。然而在投敌叛变的事实面前,革命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叛变者,则是政治立场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随着重构文本不断加重胡文玉的叛变行为,许凤的角色身份同步从[+爱情伴侣]抽离,对胡文玉的接受关键词也从道德话语“恶心”→阶级话语“仇恨”。

(三)许凤—公开叛徒身份的胡文玉[-革命]→[-性+恨]

胡文玉的角色形象沦为“叛徒”,[-革命]成为其身份标志和行为准则,两人之间对立角色关系确立,爱情关系即刻被清理,从两人[-性+爱]重构为[-性-爱],最终重构为[-性+恨]。其间有一标志性事件是对胡文玉实施抓捕。1958版实施抓捕是队员武小龙,1960版置换为许凤,场景和话语全部重置,我们注意到抓捕情境中,许凤连续使用的十个祈使句:

- (1)“站住!举起手来!把枪扔在地上!”(命令)
- (2)“走!”(命令)
- (3)“站住!不许过来!”(命令和禁止)
- (4)“……,走!”(命令)
- (5)“走!……”(命令)
- (6)“你不走,我就杀死你!”(命令)
- (7)“立起来,走!”(命令)
- (8)“你走!不然我就开枪!”(命令)
- (9)“走快点,你不要打算从我手里逃走!”(命令)
- (10)“别说废话,快走!”(命令和禁止)

从信息交流角度看,祈使句是用来实施指令行为的重要手段,一般分为命令、禁止、请求、希望、劝诫、商量等六类,它们的语力级差和语气强

弱显示<sup>①</sup>,命令和禁止强制程度和语气均为最高,操控性最强,其中命令句为肯定的强制命令,禁止句为否定的强制命令。命令/禁止祈使句预设条件是表达者的权威高于接受者。1958 版,许凤实施劝阻话语更多选用表示请求、希望、劝诫或者商量的祈使句,暗含其话语角色的附属感和依赖感。在政治立场不断强化的语境下,排斥情感因素的命令/禁止祈使句已经成为 1960 版本本重构排他的唯一选择。

虽然上述十个语例的组合形态不尽相同,但并不影响它们的共性,它们在同一情境中聚合成了有共同意义指向的集合体。在文内交流系统的抓捕情境中,直接表达者(许凤)和直接接受者(胡文玉)是明确的,使用的命令句和禁止句均没有呼语,也没有醒示语和辅助语,只聚焦核心行为语<sup>②</sup>。上述语例中,许凤祈使的核心行动语体现在话语的谓词性词语上,谓词性词语多数为单个单词(如多次使用“走!”),也包括动补短语(如“立起来!”“站住!”等)、偏正短语(如“不许过来!”“快走!”)、动宾短语(如“举起手来!”)等,正面下令的命令句和否定、反面下令的禁止句并

置,语调短促、口气强硬、言词急促,态度坚决,不容辩驳,搭配上省略号所省略的“突然厉声、威严的、严厉地、咬牙切齿地、冷冷地、依然严厉地、突然大声、用枪一顶/顶了”等修饰许凤下命令/禁止时的语态,显示了许凤在两人角色互动中的绝对权威,从对话交际中不难觉察两人之间清晰可见的敌我界限。

两人角色互动的对立升级,可以从多版本对“钢铁的心”一章中劝降话语的修辞置换得到更好的说明。“钢铁的心”一节主要叙述许凤被捕后,胡文玉劝降的表达话语和许凤的接受反应。虽然胡文玉的劝降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但归于失败的修辞策略却历经了四个版本的置换,篇幅比重大致呈现为:1958 版 1 484 字符;1960 版 1 645 字符;1961 版 1 663 字符;1962 版~1978 版 2 983 字符。其中,1958 版最短;1960 版置换内容最多;1961 版较 1960 版篇幅差别不大,置换力度也较小;1962 版~1978 版实施话语增扩,篇幅最长。各版本的置换内容集中在正反角色情态话语和角色互动,我们选取视觉信息、接受反应、角色互动、情感导向、谈判结局等作为观察点(见表 5)。

表 5 五个版本“钢铁的心”话语置换核心信息

观察点	版本			
	1958 版	1960 版	1961 版	1962 版~1978 版
视觉信息 (许凤)	红肿的眼泡/止不住的泪水	发青嘴唇翻动/恶心兽类的声音	这个丑恶的动物	看这个叛徒到底玩弄什么阴谋
角色互动	胡:要拉许的手/许:躲开	许:打胡耳光(打得胡后退、打掉眼镜)/胡:想掏手枪而未掏出	许:打胡耳光(打得胡倒下、头撞墙、眼镜摔破)/胡:掏出手枪瞄准许	许:撕破名单,一把摔到胡脸上/胡(叙述空白)
接受反应 (许凤)	心如刀绞/热血翻滚/咬咬牙忍住感情/不好赶他/冷笑一声/无情地说/坚决地说/	盯着/射出/眉毛陡立/愤怒的浑身抖/刺人的利刃的眼光/该死的叛徒/咬牙切齿地骂/斩钉截铁地一挥手/严厉地喝道/轻蔑地哼/满腔怒气/严厉地望	充满仇恨地盯/严厉冷峻的目光/逼视/巍然不动地立着/昂首挺胸地/爽朗自豪的大笑	冷冷地看/昂起头/眉毛倒立/射出愤怒的光芒/恨不能一掌打死/冷笑着/爆炸的怒气/蔑视地冷笑/一把摔/傲然地扬起头
情感导向	同情、愤怒	仇恨	仇恨+	仇恨++
谈判结果	劝降失败	劝降失败	劝降失败	劝降失败

特定时空场景下,选择适宜的角色显隐状态进行表达或者接受,关乎一个人对角色意识的认

知,体现人的成熟和理性。而表达主体对作品中人物显隐角色的处理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表达主

<sup>①</sup>张美兰:《〈祖堂集〉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85 页。

<sup>②</sup>布拉-库尔卡(1989)等将指令行为划分为醒示语、辅导语和核心行为语,其中,醒示语是引起受话人对指令行为语感知与注意的话语部分,辅助语是指令行为语前或后的辅助性成分。两者分别起着重要的礼貌调节和策略调节作用。核心行为语则是发出指令要求的话语部分,可以同醒示语和辅助语共同构成指令行为,也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指令行为。参见:王福祥,吴汉樱:《欧美、俄罗斯、中国语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7-79 页。

体对政治立场的选择和认同。许凤和胡文玉的角色关系在胡文玉[+革命]时呈现为[+爱情伴侣+革命伙伴],在胡文玉[-革命]时呈现为[-爱情伴侣-革命伙伴],这是在革命意识形态规约下,许凤应该表现的角色身份感和表达者应该坚守的修辞操作。

以此为标准考量1958版这一章的叙述,不难发现,用“劝降”来概括1958版中胡文玉的话语策略并不准确,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忏悔”,“呆呆、痛心而缓慢、悲痛、绝望、悲痛、沉默、苦笑、恋恋不舍、徬徨失神”等9个情态词语,以及10次“哭”及类义表达,建构了直接表达者的角色形象,此时胡文玉的叛徒角色处于隐性状态,他暂时回归作为许凤爱情伴侣角色,选择许凤[+爱情伴侣]角色主体进行言说,在回顾坦白自己的心路历程时,他的个体感受向曾经的爱情伴侣全方位敞开,甚至一再表露愿意为许凤而死。话语容易助推现实建构,目睹胡文玉的爱情独白和恋爱至上的姿态,尤其面对胡文玉“红肿的眼泡,止不住的泪水”(视觉信息),许凤虽然也做出了“冷笑、无情、坚决”等拒绝姿态,但也展露了“心如刀绞,热血翻滚”“不好再往外赶他”等柔性举动,而且她的情感克制需要“咬牙”,才能让自己重返敌我情境、回归角色理性,此时许凤对胡文玉的情感导向仅为同情、愤怒,由此招致了不少批评。当时就有评论称许凤对胡文玉“缺乏更痛切、有力的斥责”<sup>①</sup>,模糊了敌我界限,冲淡了革命主题的表达,是“全书中的一些不能容忍的和整个作品绝不调和的败笔”<sup>②</sup>。

接受者对1958版的质疑和批判正是后续版本纠偏重构的重点。

1960版对1958版的置换是全方位的。置换之后,胡文玉的彷徨和痛苦、忏悔和赎罪以及许凤一时犹疑袒露出的心软和怜悯话语都已删减殆尽,呈现为革命者和叛变者角色的对立分野。主体间关系的变化,外化为劝降语境下的动作和非动作语言。此时叛徒胡文玉的角色形象展露出了丑态(“咬着牙齿,嘴歪了一下”)和凶相(“恶狠狠地”“恼怒绝望”)以及极力演绎出的“好演员、装模作样、有声无泪地装出哭腔”的惺惺作态。

从许凤的视觉信息反馈出,胡文玉已经从“红肿的眼泡,止不住的泪水”的可怜形象,变身为具有“发青嘴唇翻动”“发出恶心兽类的声音”的对象,接受反应呈现为情态各异的“愤怒”(含类义表达)共计12次,同时搭配表示程度的形容词、副词做修饰,以语词调动情感力量,以仇恨为书写落脚点,许凤的接受反应越大,抗争性越强,说明其革命的角色身份越凸显,革命立场越坚定。角色互动同步升华为:胡文玉想掏枪威胁最终克制,而许凤用两个耳光表达对反面角色的愤怒,[+爱情伴侣]角色关系隐退,直至踪迹全无,主体间关系界限分明,毫无模糊地带。

1961版相较于1960版变动虽然不算太大,但聚焦的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性:一是置换了1960版胡文玉想掏出手枪而未掏出的细节,修改为掏出手枪用实际行动彰显自己反动立场,以及用枪口瞄准许凤的直接威胁。二是增写许凤高昂的战斗姿态和精神风貌。与此同时,许凤加之于胡文玉的巴掌也同步升级,胡文玉的言后行为从“后退了几步”“打掉眼镜”进阶为“倒下、头撞墙和眼镜摔破”,对立和仇恨的情感导向都更进一步,二元对立姿态更为醒目。

1962版~1978版的变动除了接受反应、角色互动、情感导向随着置换渐趋增强之外,增扩话语主要聚焦在许凤得知自己将被处决的消息,争分夺秒地酝酿,谋划和部署越狱行动,考虑游击队今后工作思路。重构的叙述修辞是许凤以[+县委领导者]<sup>③</sup>的身份在场,增扩的篇幅是对该政治角色的强力书写,而这恰恰是之前版本话语所缺失的。

个人的角色身份可以是显在的,也可以是隐在的。显在角色和隐在角色不仅产生不同的表达,也产生不同的接受<sup>④</sup>。[+爱情伴侣+县委领导者]代表了许凤不同的角色身份,1958版让许凤[+爱情伴侣]角色处于显在状态,1960版~1978版则让许凤和胡文玉旧日的情爱关系,被革命意志的权力规约压制,于是胡文玉劝降时有意召唤起许凤[+爱情伴侣]角色中往日真情的话语修辞归于失败,文本叙述重归许凤[+县委领导者]这一显性角色在面对革命叛徒时应该有的冷峻和无情,这也是本节劝降话语在多版本重构中

①储松年:《〈战斗的青春〉的成就和缺点》,《文艺月报》1959年第7期。

②冯牧:《谈〈战斗的青春〉的成败得失》,《文艺报》1959年第11期。

③在连续取得韩庄、郭店大捷之后,许凤被调往县委,接替县委书记周明的工作,不再担任区委书记。

④谭学纯:《广义修辞学三层面:主体间关系及相关问题》,《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1期。

遵循的基本操作逻辑。

## 二 许凤—胡文玉:角色位移与文本建构

版本修改,不论涉及词语、句子还是段落,归属规范类的最好要改,归属审美类的改了比不改更好,归属政治类的不得不改,这些构成了特定时代语境下《战斗的青春》版本重构拼图中的局部微调,这些调整可以是调节性的修辞元素,也可以

是结构性的修辞元素。前者是修辞技巧研究的对象,后者作为影响小说变局的关键元素,进入修辞诗学研究视野。广义修辞学认为,作为修辞生动形式的词句段,如果同时影响语篇的叙述结构乃至最终的语篇定型,相应的修辞研究需要从修辞技巧层面向修辞诗学层面延伸<sup>①</sup>。许凤—胡文玉角色关系位移这一局部修辞重构,产生了推动版本重构的叙述能量,规约了小说后半部分的情节走向,影响小说重构文本的整体定型(见表6)。

表6 胡文玉叛徒身份显、隐状态分布的文本区间

对比	版本	
	1958版	1960版~1978版 <sup>②</sup>
胡担任区委书记对应的文本区间	第一节~第一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四节
胡叛徒身份[+隐性]对应的文本区间	第一二节~第三七节	第二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三节
胡叛徒身份[+显性]对应的文本区间	第三八节~第七〇节	第六章第四节~第十章第八节
胡叛徒身份显/隐状态占整部小说比例	52.9%/47.1%	55.6%/44.4%
胡出场的章节数量占公开叛徒身份文本区间比例	24.2%	62.5%

从胡文玉叛徒身份显隐状态分布的文本结构来看,重构前后[+隐性/显性]文本区间占小说的比例大致各半。胡文玉[+革命]的叙述增写出现在叛徒身份处于隐性阶段,通过许凤的回忆完成,重构比例较小,对于版本重构后文本意义和价值主题改变不大,不作为分析的重点。数据对比显示,1958版和1960版胡文玉在小说后半段出场占比分别为24.2%、62.5%,胡文玉在1960版后半部小说出场比重是1958版的近3倍,梳理人物出场与否及对抗性强弱在叙述结构中的情况<sup>③</sup>,发现1958版胡文玉出场和对抗性有三种组合:[-出场0对抗][+出场0对抗][+出场-对抗],整体角色形象呈现弱对抗性和无对抗性特征,而且胡文玉是否出场随机分布,角色不具备文本建构功能,甚至可以说在后半部小说似有却无。我们重点阐释胡文玉公开叛徒身份后两人的角色关系位移的不同处理,及其在文本建构层面所起的影响。

1960版,胡文玉的敌对情态转变可以从以下增加的话语见出:

- (1)“我到这边来了……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哈哈!”
- (2)胡文玉一咬牙暗道:看你还逃

得出我的手心!

(3)胡文玉翘着嘴角阴险地微笑着说道……

(4)胡文玉骑在大洋马上,站到前边冷笑一声……

(5)胡文玉听完了,……向全场的家伙们扫了一眼,又喝下一杯酒,大声嚷道:“我要……我搞到了……我知道……一定……并且……都……晚上就行动……”

五个语例大多采用肯定句式,选用“知道”“一定”“都”等确定语词,以及“翘着嘴角”“阴险”“一咬牙”“冷笑”等情态语词,一改重构前胡文玉犹疑彷徨观望的动摇主义者形象,摇身变为自信、凶狠、极具威胁的最主要反面人物。对比两个版本的敌对势力排序:

1958版:宫本、渡边、赵青、齐光第、张木康、王金庆、胡文玉等

1960版:胡文玉;赵青、宫本、渡边、王金庆等

其中,1958版敌人以个体线性出场、平均分布,突出群体合谋,没有特别彰显某个反动个体,

<sup>①</sup>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sup>②</sup>作为第一次修改,1960版对1958版的改动从量来看“增删十万字”,变动最为典型,后续版本都在此基础上调整,变动数量也趋减,因此本节分析以1960版重构文本为主。

<sup>③</sup>为了叙述简洁,依然用义素法标记,其中[+对抗]表示强对抗性,[-对抗]表示弱对抗性,[0对抗]表示无对抗性。

而胡文玉因其弱对抗性,在敌对势力中存在感低,几乎可以被忽略。1960 版包裹着“胡文玉”在场的多处段落增写,在后续文本的系列情节链中一亮相:

(1)“胡文玉”设计突击包围岳村,致使李铁险些被捕→(2)“胡文玉”设计拂晓包围高村,致使游击队被动连夜疏散撤离→(3)游击队伏击日伪军汽车队大获全胜,尽管化装成日伪军,“胡文玉”一眼就识破→(4)“胡文玉”设计大量抓捕群众,设立集中营,诱使游击队上门→(5)“胡文玉”使用离间计,给区干部写招降信→(6)“胡文玉”现场“观摩”被毒打的群众→(7)“胡文玉”亲自带领围攻高村→(8)“胡文玉”最早怀疑韩庄据点有游击队的卧底→(9)“胡文玉”利用许凤不在场,设计新一轮清剿计划→(10)“胡文玉”亲自指挥,致使许凤越狱失败并再次将其抓捕→(11)失败后“胡文玉”化装出逃被李铁砍于马下

在 11 个增加的情境里,胡文玉是每一场战役或冲突的施动者和推动者,每场战役或冲突的叙述呈模式化,该模式化结构可以简化为:

反面群体合谋商议→胡文玉“精准”施策→反动头目夸赞胡文玉→胡文玉亲自带队→计谋起作用,游击队受打击(受打击力度随版本变动逐渐降低)→游击队评价胡文玉的破坏性,欲除之而后快→从头接续循环

情节链上的每一次增写形成叙事结点,不断制造角色关系[-对抗]到[+对抗]的叙事高潮,固化文本对立氛围。

该模式的结构复制中,胡文玉在正面战场实体和后方战场在游击队员的话语中交替出场,滚轮式推进文本叙述进程,并一张一弛调控着文本的叙述节奏,在调控中持续将人物的无对抗和弱对抗转向对抗以及强对抗。

客观地说,1958 版胡文玉虽只集中在上半部

小说出场,但人物的复杂心理不乏浓厚的“心灵的复杂和灵魂的冒险”<sup>①</sup>,甚至相当程度地涉及对人性的深刻开掘,就小说内容深度和思想的多义等艺术标准来看,该版本优于接续的重构本。不过,溯源版本优劣的相关评价,会发现 1960 版在当时赢得了更多认可,1960 版出版时扉页附有“内容提要”,明确指出该版本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优于 1958 版。1960 版对胡文玉形象的塑造较之 1958 版“更完整更深刻也更令人憎恶”<sup>②</sup>,刘金这一分析评价,也展现了时人政治标准第一的认知参照,就此而言,1960 版及后续版本是不断趋近主流意识形态标准的文化产品。

这一点在 1960 版后半部小说的重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胡文玉与革命过往彻底决裂,伴侣之爱、战友之情全然消失,重构的形象,虽在艺术层面失却了些许动人的味道,但情节链的逻辑推进并未出现断裂感,话语重构也并未给接受者带来阅读障碍,这得益于表达者在弥缝人物性格断裂所做的修辞加工:偏重政治角色轻爱情角色,设置了胡文玉的角色转化以及他与许凤这一角色关系从“情感关系→政治关系”位移,角色位移促使角色关系中[+恨]的语义分量随着截然对立的角色关系重构产生了叙述动力。推动文本建构的修辞细节,叙述能量绝不限于容易观察到的微表情,而属于“为整体的细节”<sup>③</sup>。换言之,角色位移这一微小的修辞处理,撬动了文本重构<sup>④</sup>。

政治语义的清晰表达和接受,是意识形态规约下表达和接受的理想状态。表达者的每一次修改都竭力“回避了初版本中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而是把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界线从心理上、行动上以及思想感情上划分得泾渭分明、水火不容。作品的意义系统变得透明、清澈,革命斗争历史的教育意义也更加鲜明”<sup>⑤</sup>。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合战争意识形态的重构文本(1960 版~1978 版)比初版本(1958 版)对立更强、战争氛围更浓,版本变动过程中角色关系的疏离和对立,也为版本重构注入了新的叙述动能,进一步推动了

① 龚奎林:《“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09 年,第 382 页。

② 刘金:《评新版〈战斗的青春〉》,《新港》1960 年第 9 期。

③ 谭学纯:《〈牛虻〉人物身份符号及角色关系:语义分析和叙述修辞》,《文学跨学科研究》(香港)2017 第 3 期。

④ 考察许凤-胡文玉角色关系位移及文本重构,不能忽略李铁、赵小鸾分别作为胡文玉、许凤互为他者的对比镜像,以“他者”作为替换项,许凤-李铁/胡文玉-赵小鸾两对情感角色关系,及版本重构走向,不失对比参照意义。限于篇幅,拟另文探讨。

⑤ 郭剑敏:《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叛徒形象及其相关的文学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 第 12 期。

相应情节的文本重构,其间展露的是不同时期意识形态松紧对于话语主体的精神建构。

这些观察只有回归到版本流变的文本现场,经由细致入微的版本对勘,才能透析情感如何从比较原初的面目经历了外在“理性”和“意志”的磨炼,最后锻造出了主流认可的产品。

### 结语

版本修改作为文学修辞的一种存在形式,不是单纯的语言学研究,也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sup>①</sup>,而需要整合语言学—文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作为本文理论支撑和方法论参照的广义修辞学,不是因为修辞学在国内现行学科目录中属于语言学科,而限于“纯语言学”的学科定位,而是吸纳“纯语言学”的理论资源;也不盲从巴赫金等学者强调的“超语言学”修辞研究,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目标而向“超语言学”场域开放,探索始于语言学的观察而不终于语言学解释的理据和实践途径<sup>②</sup>。

版本修改作为一种修辞行为,其本质是在特定意识形态规约下对前版本的一种修辞重构。从文本重构呈现的艺术事实看,作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不仅仅局限于词句段的封闭式锤炼,而是在文本内外各类因素综合参与下的一种修辞处理。

可能包含不自觉的修辞认同,也可能包含自觉的修辞设计,是一种接受后的再表达,并在“表达—接受”双向互动中循环推进版本修改。由此观之,版本修改不仅涉及话语重构的修辞技巧,更有文本重构的修辞诗学,以及主体精神重构的修辞哲学考量。从《战斗的青春》五个版本变动中“许凤—胡文玉”情爱关系角色位移的修改,反向追问版本变动“改了些什么/如何改/为什么这样改”,综合语义分析和修辞考察,阐释角色位移路径,管窥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投射于文本,如何奠定修辞重构基调。也许,在文本人物的人性深度和阶级性敏感度之间、在作家的艺术感觉和时代的审美诉求之间,属于个人的话语空间有限,但在有限空间的腾挪正是值得细读的文学现场。重返版本修改现场,并不意味着重拾已成历史的评价资源,也不意味着逝去的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而是忠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文献事实。对于未曾经历那段岁月的人们来说,尽可能拉近今天的文学想象和昔日风景的距离;对于亲历那段岁月的人们来说,也许可以重新审视经典的生成,以及文学经典化过程。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为延展版本研究的维度和中国当代小说史、思想史研究的厚度,提供广义修辞学的观察与解释个案。

## On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and Rhetoric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Five Versions of *Youth in the Battle*

WANG Xiao-yan<sup>1,2</sup>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Fuji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tailed comparisons as well as semantic and rhetorical analyses of the five versions of *Youth in the Battle*, this paper sets out to clarify the role rel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Xu Feng and Hu Wenyu (from the Party secretary of a district committee to a traitor), representative of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o drive home the accompanying narration of love in the form of rhetorically rewriting such transformations as  $[-sex+love] \rightarrow [-sex-love] \rightarrow [-sex+hate]$ .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rhetoric to the practical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me novel, through exploring in a reverse manner, i.e. “what, how and why” of rhetorical writing as both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will hopefully be a model for further case study of this nature.

**Key words:** *Youth in the Battle*; role transformation; rhetorical reconstruction; general rhetoric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朱玲:《布斯〈小说修辞学〉:阐释与对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②谭学纯:《广义修辞学研究:理论视野和学术面貌》,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3页。